

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过的文化遗产

岳麓书院：绵延千年的中华智慧

□ 成 希

洙泗瀟湘，道南正脉。千年学府，弦歌不绝。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察调研，了解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小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大家熟知的概念，指出这些概念都是从文化经典中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导同学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沃土，坚定文化自信。

纳于大麓、藏之名山

岳麓书院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岳麓山脚下，湖南大学校园之中，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修复最好的书院建筑。自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院经由湖南大学管理和修复以来，书院承担起延续了千年的教育办学和学术研究传统。

书院，始于唐、兴于宋，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传承儒家文化的重要教育和学术之地。自李唐以降，中华大地有据可查的书院就有七八千所，而岳麓书院是唯一一个延绵千年且依然焕发着生机和活力的书院。唐末五代，岳麓山上两位僧人想以“儒者之道”教化世风习俗，于是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此基础上“因袭增拓”，正式创建了岳麓书院。由于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理念和方法，书院创办不久即声名鹊起。1015年，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亲赐“岳麓书院”匾额，岳麓书院愈益名满天下。此后岁月里，尽管朝代更迭、兵燹不断，岳麓书院始终顽强地保持着文化教育的连续性。清代末年，朝廷颁行“新政”，废书院、办学堂，在岳麓书院旧址上先后改造或兴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等，直至1926年定名湖南大学。千余年来，这里始



终都是湖南高等学府所在。岳麓书院之所以独特，不仅在于其悠久的历史，更在于她清晰地记录了古代的高层次书院到近代的高等学堂再到今天的现代大学改革和变迁的过程，堪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极其珍贵的活化石。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纵观岳麓书院千年办学历史，其最大成就就是培养出了一代代以天下为己任、致力于匡扶济世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或开风气之先，或担民族之责，或创不世之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演进，尤以近现代为著。从鸦片战争前后为开端，先后涌现了以陶澍、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改革派，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领导者，以谭嗣同、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志士，以黄兴、蔡锷等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者，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等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岳麓书院颇负盛名的楹联，成为书院人才培养的传神写照。

为什么这里能培养如此多彪炳史册的人物？这与岳麓书院始终贯穿的办学宗旨和传承的湖湘文化精

神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湖湘文化的重镇，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就明确提出“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历代山长均倡导“重践履、务实学、通时务”，强调培养的人才要以身传道和践道、以道济民和体国，注重将个人道德的修养和经邦治国的事业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岳麓书院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

经世致用、实事求是

“经世致用”是岳麓书院培育人才最鲜明的价值理念，其思想的形成和发扬，离不开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明末清初岳麓书院杰出的学生、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王夫之又称船山先生，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问题论述的集大成者，也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开创者。他继承并发展了岳麓书院重实践的传统，在岳麓书院读书期间，创办了“行社”。他熟读经书，却不为经书的现成结论所束缚，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励；强调学术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理论探讨应该致力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随着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中兴名臣把船山学广泛传播，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观念和学风极大地

影响了广大湖湘学子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塑造。

1917年至1919年期间，杨昌济先生在岳麓书院负责主持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青年毛泽东得恩师杨先生支持，曾数次寓居书院的半学斋自学并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正在岳麓书院办学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校训“实事求是”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实事求是”四个字深深印刻在青年毛泽东的心中。也正是那段时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学，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实施“岳麓新村”计划，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在了解实际、掌握实情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理念和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契合中国社会实际与文化传统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就来源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

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宛如一幅画卷，清晰地展现出中国高等教育不懈探索、中华文脉传承创新的历史变迁。

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麓书院中国书院博物馆参观时指出，要把“真理本土化”。殷殷嘱托，犹在回响。今天的岳麓书院始终保持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充分挖掘湖湘文化、革命文化和书院文化“富矿”，通过专题展陈、研学宣讲、课堂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作品、论坛交流等多种方式和载体，讲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案例，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打造成“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传承基地和展示“两个结合”思想成果的重要窗口，以独特的历史文化培育人才、传播思想、引领风尚，以新气象新作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君子之交淡若水”语出《庄子·山木》：“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郭象注曰：“无利故淡，道合故亲。饰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时而绝也。”意思是说，君子之交不受利益所累，像水一样恬淡自然，所以能够长久亲近；小人之交多受利益驱使，如甜酒一般芳香醇人，然而一旦利益散尽就会交情断绝。

理解“君子之交淡若水”，关键在于一个“水”字。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哲学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观点。“水”在道家哲学观中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象，而是“道”的象征。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庄子把君子之交比作水，是继承了老子“上善若水”的思想，将“淡若水”的君子之交视为人际交往的最高境界。这里的“淡若水”，并不是说君子之交像水一样寡淡无味，而是指像水一样纯净清澈，不尚虚华，不掺杂质，没有功利之心，不被世俗所累，也就是纯粹，即接近于“道”。

君子本是儒家学派崇尚的理想人格的典范。儒家创始人孔子曾从多个角度对君子和小人作过比较，其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对君子和小人进行辨析，认为君子做事考虑的是原则义理，小人做事考虑的是利益得失，从而揭示了君子和小人的本质区别。庄子虽然不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在“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潮影响下，庄子沿用了孔子君子与小人的说法，以功利主义作为分野，对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进行厘清，揭示出人际交往的真谛是发乎天性、回归本真，即不掺杂任何功利的志同道合、意趣相投，而不是互相拉拢、彼此利用。

庄子之后的许多文人士大夫，继承了庄子“君子之交淡若水”的观点，并对其进行引申、阐发，使得“君子之交淡若水”成为长期以来备受文人士大夫推崇的人际交往准则，同时也逐渐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并世代流传。三国时诸葛亮《论交》有云：“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西汉戴圣在《礼记·表记》中对庄子的提法进行改造：“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唐代杜甫创作《贫交行》诗：“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南宋辛弃疾在《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一词中写道：“味甘终易坏，岁晚还知，君子之交淡如水。”北宋欧阳修《朋党论》对君子之交的阐释更加清晰：“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



□ 赵迎辉

君子之交淡若水

所惜者名节”“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以上种种论述，通过对君子之交的赞美和对利益之交的揭批，表达对于至真至纯的人际交往的美好期许。而对于“利交”抨击最为激烈的，当属东汉朱穆的《绝交论》和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刘峻的《广绝交论》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刘峻的《广绝交论》是对朱穆《绝交论》的申广、延伸，文中对“利交”即功利主义的交友观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利交”的五种流变：势交、贿交、淡交、穷交、量交，“凡斯五交，义同贾鬻”，认为“利交”其实就是做生意，目的不是寻求心灵契合而是进行利益交换，跟真正的交往相去甚远。

人际交往是自古以来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交往动机的把握、交往原则的秉持以及交往对象的选择各不相同。“君子之交淡若水”作为传统社会交友的至高境界，对我国封建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关于君子之交的经典故事，比如心有灵犀互为知音的伯牙子期、志趣相投相谈忘食的尹敏班彪、相知至深彼此信任的管仲鲍叔牙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市场经济建立、信息技术应用、陌生人社会形成等都对人际交往提出新的挑战。重温“君子之交淡若水”，挖掘其丰富内涵和深刻意蕴，对于培养正确的交友观，营造良好的社会交往风气，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双语通识教育助推中华典籍文化走向世界

□ 梅 轩 汪长明



卷帙浩繁的各式典籍中蕴含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悠久绵延的历史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大力推行典籍文化中英双语通识教育是推进中国声音全球化表达的内在需求与重要方式，不仅能够加强典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能通过双语通识教育推动中华典籍文化国际时代生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通识教育：让中华文化从典籍走近大众

中华典籍浩瀚如烟，涵盖历史、文学、哲学、科技、军事等不同学科，并以不同民族语言形式呈现于世。这些典籍文化往往内容繁多、内涵丰厚、意蕴深远，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和文化叙事的双重书写。通识教育是开展中华典籍文化教育最直接、最广泛的一种形式。古代的大学、小学都会教授经典，经典教育承担了传统教育的大部分功能，但在如今的大学教育中则严重缺失。

相比中小學生而言，大学生在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辨识能力、国际传播、社会责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

较优势，既在教育对象上成为中华典籍文化通识教育的“当然主体”，又在社会效果上可以实现从客体向主体身份转化，成为助推中华典籍文化大众化、国际化的使者。实际上，国内很多高校已经将典籍文化通识教育付诸实践，以春风化雨的方式着力推动中华典籍文化扎根大学生心灵。但总体而言，各高校开设的典籍文化通识教育课程无论数量上还是范畴上均有待提升。通识教育的使命不仅在于突破专业教育的边界，促进青年学生全面学识的形塑和完整人格的养成，还在于让学生理解、认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使其自觉成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弘扬者。

借助通识教育有效传播中华典籍文化，需要打造一批彰显中国精神的“文化金课”。为此，在顶层谋划上，各高校院系应注重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开设相应的典籍文化课程，做到教育主体全覆盖，逐步在全国形成较为完善的典籍文化通识教育体系。在课程设计上，典籍文化通识教育既要注重课程的思想性、学理性和专业性，也要兼顾课程的趣味性、感染性和启发性，引导青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典籍中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时代记忆。在实践传播上，典籍文化通识教育应注重第一课堂与第二

课堂相结合，践行“知行合一”教学理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跨文化大赛、游学、讲中国故事等课外活动，将内化于心的典籍文化外化于行。

语言赋能：让中国叙事从本土走向世界

典籍文化对外传播中因语言差异产生的传播壁垒不容忽视。行文上，很多典籍皆以文言文书写，相对于普通话而言虽然形式上更加简练，但内容上往往晦涩难懂。有些民族典籍更是以少数民族语言、外文甚至是已经失传的语言记录。这进一步增加了阅读、理解和外传的难度。内容上，中华典籍往往灵活多变、意蕴深远，内容负承载力极强。比如，单“道”字在用法上就千变万化，意义辐射范围很广。典籍文化对外传播属于异质文化传播，中外语言中蕴含的不同文化特质、精神内核、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等均对其传播造成阻碍。如何采用符合目的语受众需求和期待的表达方式精确对外传播典籍文化乃一大难题。为此，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行由国内外专家协作的国际高标准专业团队开展“汉典外译”工程，旨在最大程度消弭典籍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语言屏障。他们的心血凝聚成了《大中华文库》、“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等厚重成果。

面向高校开展典籍文化通识教育有助于让典籍文化从图书馆中的“陈列品”转变为大众生活中的“日用品”。然而，实现中华典籍文化走向国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时空愿景，还需借助国际通用语的传播优势。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当代大学生或许并不完全精通国学经典、唐诗宋词、民风民俗、儒家道学等传统文化，但从小浸润其中的文化熏陶让他们或多或少知其概貌，难的是如何用英语准确说出其中的文化意蕴。因此，规范意义的典籍文化通识教育应当是一种中英双语模式的通识教育，不仅让青年学生更加了解汉典中的文化蕴含，还需让他们知晓如何精准地用英语传达出这些蕴含，从而走出“只知其意、不知表达”的文化传播困境。

为了更好地开展典籍文化双语通识教育，大学应有效发挥立德树人功能，积极推进文化对外传播。第一，加强双语师资建设。中华典籍汗牛充栋，典籍文化博大精深，因此培养一批功底扎实、精通英语、善于教学的师资力量，是推行典籍文化双语通识教育的前提。第二，致力双语内容建设。依据教师所长和权威双语教材、语料库等适量、適切选取典籍素材，精心设计课程内容，从而实现课程的质量目标和教学功能。第三，借助网络媒体平台。在全媒体时代，互

联网无疑是文化传播最便捷、最广泛、最具外溢效应的载体。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且易于理解的语言将典籍文化从现实课堂搬到网络平台，有助于实现中华典籍文化的全球共享。

文化传播：让青年学生从客体变为主体

推行双语通识教育只是促进中华典籍文化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必要手段，其终极目标仍在于借助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全球胜任力的青年学生将中华典籍文化推向全世界，其中尤其需要注重发挥海外留学生（包括访问学者、孔子学院学员等）、来华留学生、从事跨国事务的毕业生等跨文化主体的文化传播主导作用。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有更多机会接受中华典籍文化教育，具有更加深厚的学术素养、更大的文化话语权以及更强的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第一，提倡一元主导与注重多元联动相结合。一方面政府应为跨文化传播事业做好顶层设计，指明传播方向；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各界阶层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创新传播形式、丰富内容和题材、拓宽传播覆盖面等，以接地气、浸润式、全图景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青年学生在推动中华典籍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需要将典籍文

化分层次、多渠道自上而下全面辐射出去。

第二，夯实文化基础与打破文化壁垒相并重。精准高效传播典籍文化的必要前提是增强文化知识积累，打牢坚实的文化基础，不断磨砺自身跨文化传播技能。中华典籍文化博大精深，必然存在青年学生不熟悉、不擅长甚至认知偏差的领域。一方面存在文化传播的失准性；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因辨识力、纠错力不足或缺失，导致他们误读误解中华典籍文化，从而影响中华典籍文化走向世界的初衷和根本。打铁必须自身硬，夯实文化基础是避免此类失误的有效途径与根本要求。

第三，坚定文化自信与镜鉴西方智慧相统一。青年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海外社会，这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直接便利。因此，青年学生首先应坚定文化自信，通过学习了解传统文化折射出的风土人情、人文精神、价值魅力、道理哲思等内容，树立中华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当然，优秀的跨文化传播者还需具备“镜鉴西方智慧、传播中国文化”的开阔视野与文化情怀。中西文化虽差异迥然，但仍有共通类比之处，青年学生以此为切入点传播中华文化则更易被理解 and 接受，从而实现中西文化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有力发声是彰显文化自信和增强文化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典籍文化双语通识教育，培养一批批掌握扎实英语能力、深厚文化素养和卓越跨文化传播技能的新时代人才，是让中华文化有力发声的有效途径，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有着重要意义。